

南
京
大
学
博
士
文
丛

“五四”作家的 文化心理

倪婷婷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五四”作家的 文化心理

倪婷婷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作家的文化心理/倪婷婷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0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ISBN 7-305-04509-8

I. 五... II. 倪... III. 作家-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77686号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书 名 “五四”作家的文化心理

著 者 倪婷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28362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l@publicl.ptt.js.cn

sales@press.nju.edu.cn (销售部)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69千

版 次 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ISBN 7-305-04509-8 I·327

定 价 22.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蒋树声

副主任 洪银兴 陈 骏 张异宾(常务)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王 颖	王明生
叶继元	孙义燧	李 成
吕 建	陈 骏	宋林飞
张异宾	吴培亨	周 宪
郭子建	洪银兴	钱乘旦
龚昌德	童 星	蒋树声
程崇庆	赖永海	谭仁祥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总 序

洪银兴

21 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从根本上说,21 世纪的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使命,博士是高层次人才的代表。如何培养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使他们在下世纪成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无论是对高校本身还是对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为了展示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的学术风采,加强学科与学术队伍的建设,促进新生学术力量的成长,经过长期酝酿与充分准备,我校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此次编进《博士文丛》中的论著,大多是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我校任教的青年教师的博士论文,是在广泛动员、严格把关的基础上,根据质量第一、公平公开、规范

“五四”作家的文化心理

运作的原则认真遴选出来的,同时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特别注重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对南大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博士文丛》虽然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基本上反映了南大青年学者丰富而活跃的学术思想,代表了南大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此次我校组织编辑出版《博士文丛》,就是从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并着眼于下世纪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领域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相信《博士文丛》的出版对于扩大我校的学术影响、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推动学科建设,一定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都致力于追求卓越,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这一人才摇篮里茁壮成长,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这块科学沃土上勤奋耕耘。近百年的办学实践塑造了南大师生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博采众长、汇融百家的开放精神和兢兢业业、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培育了南京大学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学风。近百年的历史,尽管世事沧桑,但这样的精神和学风一直在南京大学传承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历久弥新。正是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学风,使南京大学深深植根于传统与现代的沃土中,不断从本民族和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吸取新的营养,形成了南大特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学术氛围,使南大在近百年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永不衰竭的青春活力,使学校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南京大学已成为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强大、科研实力雄厚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

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学术大师,一流的学术大师又离不开一流的学术环境。在迈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南京大学将一如既往,继续改善条件,为广大教师创造更好的学术环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

境。同时我也衷心希望全校教师尤其是广大中青年教师,发扬我校优良传统与学风,在南大优良的学术环境里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的学术水平,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1999 年 5 月 20 日

目 录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 洪银兴

引言 “五四”作家的文化心理与“五四”文学 1

第一章 “自我”主体人格的建构 9

第二章 “人生究竟”的追问和生命意义的思考 34

第三章 “名士气”：传统文人气度的投影 59

第四章 “非孝”与道德情感的两难 93

第五章 启蒙理性思维与启蒙话语方式 123

第六章 求异及其变异：蜕变中的审美矢向 163

第七章 世俗化的宗教感悟 194

第八章 地域胎记、风土感化与文人风致 245

主要参考书目 306

引 言

“五四”作家的文化心理 与“五四”文学

近二十年来,“五四”文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观照的方式和途径更是不断出新,不同的思路和方法为“五四”文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承认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难免顾此失彼的局限性的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某些新的研究方法运用得当,确实会带来对一些研究对象的新的认识,并得出其他研究视角无法得出的结论。从“五四”新文学处于旧的传统文化和新的现代文化交替时代这一特殊性出发,本课题采用了从“五四”作家文化心理分析入手去研究“五四”文学的思路。我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暨文学革命首先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变革运动。当固有思想文化的稳定结构被突破后,“五四”新文化人即开始了新的现代思想文化体系的建构。外来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成为他们观念更新、思想转换、精神变迁的前提。作为新文化的载体和产物,“五四”新文学相应显示出不同以往的文化质态,而其直接原因,即取决于“五四”新文学创作主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性嬗变。正因为有“五四”作家文化心理结构的适时变革,才会有中国新文学在 20 世纪基本走向的根本性转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五四”作家的文化心理

考察并探究“五四”作家的文化心理,将是“五四”文学研究进入深层领域的必要途径。因为,它不再满足于表层现象的描述,更侧重于文学现象背后深层结构的解剖。这种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对“五四”作家人格特征和文化品位的透视,必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五四”文学的历史动因、发展脉络,并更有效地把握“五四”文学的精神实质。

将文学研究视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这样的构想似乎并不新鲜。20世纪30年代李长之即在《论研究中国文学者之路》一文中指出:“文学内容不是独立的,而是有着文化价值的整个性的。专就文学而了解文学是不能了解文学的,必须了解比文学的范围更广大的一民族之一般的艺术特色,以及精神上的根本基调,还有人类的最共同最内在的心理活动与要求,才能对一民族的文学有所把握。”李长之还以他自己对陶潜及其诗作的理解过程为例,说明“了解作品,必须了解一个作家的整个”,“不了解一个民众的文化的整个,依然不能了解一个作家”,“非了解一个时代的整个,是不能了解一个作家”,“不了解人类,是不能了解个别的作家的”。李长之的结论是:“为了解作家,须明白时代精神,须明白民族文化,为把握后者,就又需要人类文化的整体的认识。”为了完好地实现这个目标,李长之提出研究者需要进行“社会科学的经济机构的考察,以及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遗传学的种种说明”^①。李长之对文学研究者文化整体意识的强调,旨在唤起他们对文学的文化价值的关注。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李长之的用心,在当时及以后较长的时间段里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中国现代文学在某种境况下甚至从文化体系中剥离出来,径直与政治相接,成为政治、政策的附庸和奴婢,文学研究者的文化视野自然也为偏狭的政治标准所覆盖。直到80年代中期,这一状况才开始有所转变,

① 李长之:《论研究中国文学者之路》,《现代》第5卷,第3期。

随着研究者文化意识的觉醒,文化学对文学研究的渗透也逐渐形成风气。

文化视角的引入,确实为突破长期以来僵化片面的文学研究格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就“五四”研究而言,文化视角运用于一些经典作家的重新审视,也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除了零碎而不成体系的局限外,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弊病:一是割裂作家所受的文化影响与他们心理现实之间的关系,没有将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考察,仅仅限于浮于表象的说明;其二是过分热衷于判断“五四”创作的某种现象归属于何种文化范畴,缺少对其中复杂精神内涵的细致分析和深刻思考,生动多样的文学现象仅仅被当成文化学研究的琐碎材料,这样的文学研究未免本末倒置,远违初衷。其中的原因自然与研究者的含混和学术根基的薄弱相关。说到底,“五四”文学研究中文化心理视角的运用,落脚点还是在“五四”作家和“五四”文学的研究上。“五四”作家接受文化影响的过程包含自觉和不自觉的多重因素,因此,文化制约与心理反应是密切联系的整体,作家的精神世界丰富而深邃,对其审美思维的把握如何可能在单一的文化特征的对应和比附中完成?研究者的文化意识并非仅仅显现为用固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去机械地裁量个性化的作家作品,研究者应具备的是对各种生动丰富的文学现象予以多重客观科学的审视能力。只有对复杂多样的文学现象包含的文化意蕴进行更为细致、审慎、深入的辨析、探究和判断,才有可能对作为个体的具体作家和作为文化群落的“五四”作家群体的精神基调有所把握,才有可能对“五四”文学的整体文化价值作出合理的诠释和准确的评价。

在尝试以“文化心理”视角研究“五四”作家和“五四”文学之时,有必要对“文化心理”这一概念进行界定。人们通常以为“文化心理”不过是两个随意捏合在一起的名词,这种看法正是他们片面割裂文化影响与心理现实关系的根源。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文化

“五四”作家的文化心理

心理学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它着重在社会组织、心理、习俗、行为、教育等多个层面上探讨个体文化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根据美国学者 J. R. 坎托出版于 1982 年的《文化心理学》的阐释,“每一个人都置身于一定的文化系统中”,都是“文化化”的人,隶属于一定的“文明单位”(文化单位),“置身于其中的成员都持有成套的共同信条,鄙夷某些事物而喜好另一些事物,作出选择而且体验某些反应”。^①所谓的“文化心理”,即指个体的“文化行为素养”,也就是“文明单位”中的成员在共同文化刺激条件下的心理反应,这正是 J. R. 坎托研究的重点。他的理论显然是建立在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思想传统的基础上的,同时也吸收了之前文化族体心理学的理论成分。1934 年,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文化模式》中提出“文化模式”的概念,她认为,任何文化只有通过个体或个人才能得以真正实现,个人既是文化存在的基础,又是文化特性的具体表现;人们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中生活,也就具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及不同的心理取向和行为取向。“文化模式”的提法与“文化心理”概念的形成出发点各不相同,毕竟坎托与本尼迪克特关注的焦点并不一致,但在研究思路,他俩的相近之处十分明显。作为心理学者,他们的研究不会超出“刺激—反应”的基本框架,而坎托由于加上了“人格素养”、“社会因素”、“环境因素”等一系列中介,来分析描述个体行为文化行为的形成发展过程,对一定群体中人与人相互作用的实际情境给予更充分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比“文化模式”的理论更宽阔的学术视野,也体现了坎托努力建构文化心理学本身的独特价值。“文化心理”的概念同时也为文学研究方法和思路的拓展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本课题引用“文化心理”的概念,旨在将文化心理学的理论视角运用于“五四”文学的研究,探讨“五四”作家的文化行为素养的

① J. R. 坎托:《文化心理学》,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8、99 页。

形成和发展对文学创作的制约和影响。从文学研究的立场出发,我们确定“文化心理”的概念主要是指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文化群体,在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共同作用下,吸收融合了多种文化成分,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包括了感知、情感、思维诸层次内容的有机总体结构。借助于对“五四”作家文化心理结构,即“五四”作家心理行为实际过程的解析透视,本课题将“五四”文学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和纷繁的文化关系中予以阐述,从而揭示其本质内涵。

正如以上所述,J. R. 坎托的文化心理学理论仅提供给本课题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我们对“五四”作家文化心理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五四”作家文化心理与“五四”文学关系的研究,试图要探明的是“五四”作家文化心理的嬗变如何影响并作用于“五四”文学生成、发展的问题。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尽管会按照当年李长之所期待的那样对作家的精神世界进行一定程度的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考察和说明,但鉴于文学研究的宗旨和立场,我们必定会尽可能避免将“五四”作家的审美思维还原为生物学、生理学甚或文化心理学的佐证和论据。由于我们最关注的是“五四”作家文化心理结构中对创作起到举足轻重影响的一些因素,因此,本课题将“五四”作家的人格建构、人生态度、情趣倾向、道德选择、思维方式、审美取向、宗教意识、环境心理纳入重点阐述的范畴,考察这些文化心理因素中最突出的特征对创作直接、间接的影响,以及影响的途径和程度。因此,这几方面的因素也成为本课题对文学研究目标下“文化心理”内涵的一个基本定义。

当然,所谓的人格结构、人生态度、道德情感等方面的因素,其实是文化心理结构中彼此相依相连的成分,它们以共同交互的方式对“五四”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总体看来,由于这一代作家置身于前所未有的新旧交替、中外交汇的文化情境中,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相应显示出纷繁复杂的内容。大部分“五四”作家成长于传

“五四”作家的文化心理

统文化的环境,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并接受过不同程度的训练,打下了相当的传统思想文化根基,这种主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所形成的文化素养决定了他们今后主导的人格趋向。成年后为外来的各种异质文化精神所吸引,他们开始自觉地汲取新鲜的文化养料,决计以此更新改造中国几千年少有变动的思想文化范式,这同时在客观上也使他们自身原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振荡,继而出现重新整合的趋势。但是,文化模式的变革需受制于诸多内在的、外在的条件限定,它具有的相对稳定性致使变革的过程艰难而漫长,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一代人急迫的改革诉求。事实上,作为新一代文化人,“五四”作家思想观念的更新,在他们自身的精神历程中尽管具有极为重要的转折意义,但他们中也有清醒的人士早已经意识到固有的思想文化将是他们毕生无法摆脱的精神桎梏,它不仅潜在地影响着这一代人对外来异质文化的选择和接受,同时也明显地制约着他们自身新型文化人格的塑造。在“五四”特有的多元思想文化碰撞的氛围中,“五四”作家文化行为素养中的各个层次,从人格理想、道德情感、价值观念到思维方式、审美取向,都无不呈现出多重交杂缠绕的状态。内心的向往与焦灼,灵魂的煎熬与挣扎,都渗透并融化在他们对形象世界的营造和把握中。这一代人文化心理的变革,无疑是初步的,更是注定了无法完全彻底的,因为他们的人格意识和人格现状始终无法合辙,人生目标与人生取向终究难以统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观念与践行的抵牾,显意识与潜意识的对抗,构成了“五四”作家文化心理结构内部深刻的矛盾和巨大的张力,这种矛盾和张力同时赋予“五四”文学难能可贵的丰富内涵。

当“五四”作家作为一个文化群落进入研究视界时,研究者显然无法回避如何协调处理作家的个性与作家群体的共性的问题。从文化心理学意义上来说,“五四”作家共处于“五四”的历史背景下,共同受到新旧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心理机制都面临着变

革、整合的趋势,这其中必定包含着某种逻辑性,也必定有一种明显的整体上的同质性因素贯穿其间。然而,在这同时,即便作为宽泛意义上的同一个文化群落,其中仍然包含多个心理集团,各心理集团的状态并不平衡,其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精神追求各有不同之处;而心理集团中各个具体的作家由于生活经历、情感体验的差异,其文化教养、品性气质和审美趣味更是不可能整齐划一,表现在文化心态和具体的创作形态上,这些不同层次的独特的存在,很自然地会被解释为必然性中的偶然性,共性中的个性,甚至是某种暂时无法确定的例外因素。我们不能不承认,任何归纳都只是相对的,尽管归纳的目的是为了更明晰地说明问题。归纳的过程有时可能疏忽或遗漏一些个别的却又是精彩而有意义的现象,这或者是属于归纳研究所难以完全避免的必定付出的代价。作为以综合归纳为主要手段的文学研究,怎样尽可能减少这种代价的出现,也许是研究者自始至终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为了真切而准确地理解“五四”作家的文化心理与“五四”文学的关系,我们从各个具体作家的文化心理的细致体察着手,同时注意将各具特色的文学现象放在整个历史背景和整体多向的网状联系中予以审视,在此基础上,本课题整体综合的把握才可能拥有坚实可靠的前提,而不至于陷入无序的混沌和空泛的苍白。点与面的结合,宏观视野与微观辨析的统一,将是我们有效地处理“五四”作家文化心理的整体性和各个具体作家文化心理的差异性关系的保障。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①这是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为他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所作的价值定位。本课题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对“五四”作家及创作的研究,也正是将“五四”文学研究推向“深刻”

^①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分册《流亡文学·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五四”作家的文化心理

的文学史境界的结果,是我们贴近“五四”那一代人的灵魂,触摸他们的心脉搏动,体悟他们的精神气度、心理传统和感性思维的尝试。人的灵魂世界微妙而精细,深邃而隐秘,要全面揭示一个时代作家文化心理结构的丰富内涵及其变异升降的来龙去脉,不可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尽一切可能回到历史的情境中,透过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考察“五四”作家文化心理结构中具有独立意义的现象特征,以此探析“五四”文学的内在基因。但我们深知,我们无力也绝无可能对“五四”作家文化心理的整体结构进行模式的还原,我们对那一代人心灵世界的探寻永远无法彻底而穷尽。本课题的研究当然还是属于初步的,课题本身也具有开放的特性,它留有更进一步探索、拓展的学术空间。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愈益趋向深广发展态势之时,我们相信“五四”作家“灵魂的历史”必定会吸引更多研究者继续关注的眼光,毕竟“研究人的灵魂”是使文学史获得“深刻的意义”的必要条件。我们期待本课题的研究能成为下一个学术行程积极进展的良好起点。

第一章

“自我”主体人格的建构

随着西方个性主义思想的涌入,中国历代士人超稳定的文化心态被打破了。“‘个人’的发见”,意味着“为自我而存在”的意识觉醒。在挣脱束缚人性、摧残人性的传统思想羁绊的过程中,“五四”新一代知识者发现了自我个体的价值,认同了自我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因而真正开始了作为现代的独立个体必备的“自我”主体人格的设计与构想。“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①,这是“五四”时代的人格发展目标。对于“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的中国人来说^②,这不啻为前所未有的人格的解放。凸现自我主体价值的现代人格理想,致使将新文学的创作作为自我人格实现的中介的“五四”作家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他们从自我出发,从主体人格发展的方位出发,向内自觉地构塑自我人格本体,向外尽可能地沟通自我人格与时代、社会的联系,以求最大限度地完善并超越自我。“五四”作家“自我”主体人格的建构过程,

① 《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② 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